

徽州文化与徽学

朱万曙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 本文侧重讨论了“徽州文化”与“徽学”这两个不同概念的内涵,指出:徽州文化是历史上徽州区域富有特色的文化积淀和文化现象,而徽学则是一门以大量的徽州文献、文书和文物遗存为依据,以历史上徽州的区域文化为直接研究对象,并通过它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徽学固然以徽州文化为直接的研究对象,但其研究对象更为广泛,其价值在于通过留存众多的徽州历史文献认识中国历史的面貌。

关键词 徽州文化;徽学;中国历史

近年来,徽州文化与徽学日益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了“打好徽字牌,唱响黄梅戏,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口号,海内外学人也越来越重视对徽州文化与徽学的研究。徽州文化为何让学者们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内涵和特点?徽学与徽州文化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本文略抒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徽州文化的内涵

徽州文化是指历史上徽州区域的富有特色的文化积淀和文化现象。

徽州文化之所以成为一个富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不是因为其行政区划稳定不变,而是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口迁徙而逐渐形成的。宋代宣和六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下辖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六县,从此以后,徽州的行政区划一直保持到民国时期(1912年)。其自然环境为较封闭的山区,历代的战乱对这里影响不大,是一个躲避战乱的地方。在历史上有两次人口迁入徽州的过程,一次是南北朝时期,一次是五代时期,中原世家大族为了躲避战乱而迁入徽州。他们在这里休养生

息,也带来了中原文化,使中原文化在崇山峻岭中得到保存和发展。

另外一方面,山区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徽州山多田少。随着人口的增加,生活需求和实际满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于是,明代中叶以后,徽州人外出经商的越来越多。他们凭借着文化水平高的优势,利用当时朝廷的政策迅速致富,并逐渐发展为一个很有影响的商帮。他们将经商的利润一部分用作继续营商的资本,一部分则带回徽州,用来购田买地,建造房屋,同时注重教育,培养子弟读书做官。正因为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本来就有优势的徽州文化得到了更好的培育,并形成了不同于其它地方的区域文化。

徽州文化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过探讨和概括。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视察黄山,曾经用5个英文字母概括徽州文化:C、B、M、E、A,即:Culture(文化)、Business(商业)、Medicine(医药)、Education(教育)、Architecture(建筑)。我们就由此入手,略作审视。

1. 商业 徽州人外出经商的时间很早,在晋代

收稿日期:2003年6月

作者简介:朱万曙,教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古代文学。

就有徽州人经商的记载,但是,大量外出经商并且以商人群体或商帮称雄于世,则是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公元1465—1505年)。

徽州人之所以外出经商并迅速崛起,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徽州山多田少,人口剧增。史料记载,隋朝末年,徽州人口户数仅仅6千余户,到了北宋元封年间,则达到12.7万余户,元代,徽州人口已经增长到82万。人稠缺粮,徽州人只得外出经商。徽州民谚道:“前生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的就是徽州人被迫经商的情况。其次,作为山区,徽州有着丰富的物产,竹木、茶叶多,文房四宝早已闻名天下,徽州的瓷土质量好,邻近的景德镇需求量也很大。同时,新安江各支流上达徽州各地,下通杭州;另外阊江、青弋江也是徽州通往外界的水路。在古代,水系是重要的交通途径。徽州人正是利用了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踏上了营商之路。再次,利用朝廷政策。明代初年,朝廷为了解决西北边境军队的粮食问题,颁布了“开中法”,商人将内地的粮食运输到西北边地,就可以领取“盐引”(支盐凭证),再支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朝廷实行了改革,商人可以直接用银子到盐运司领取盐引,从而省却了运输之苦,这叫作“折色开中”。“开中法”实施的时候,对山、陕商人有利,“折色开中”后,对徽州商人则非常有利,因为朝廷在扬州设立两淮盐运司、在杭州设立两浙盐运司,所以成批的徽州商人来到扬州和杭州,经营盐业,获得了利润。

至迟在明代中叶,徽商之富已经让当时的文人学士惊叹不已并加以记录了。明人谢肇淛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徽商之富在明代中叶以后的“三言”“两拍”等小说里有很多描写,例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孙富就被写成徽商。明代末年,因为战乱,徽商暂时遇到了挫折,而在清朝康熙至道光的一百多年间,徽商再度兴盛。

道光中叶以后,徽商开始走向衰落。其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战乱。太平军起义后,与清政府的战争持续了18年,1853年洪秀全定都南京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成为太平军与清军的主战场,而这里恰恰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区,战乱导致了长江航运的中断和阻塞,也使得徽商在江南市镇的商业

活动陷于瘫痪。除此之外,徽商的家乡徽州也饱受战争之苦,从1854年太平军第一次攻入徽州,到1864年清军剿灭徽州的太平军,前后达12年,曾国藩的湘军在祁门设立大营,在徽州大肆劫掠,一些徽商本来携带着资产回乡躲避战乱,反而遭到洗劫,徽商的家园和资本损失巨大,元气大伤。其二,盐法改革。徽商经营的行当虽然很广泛,但是,从明代开始,让徽商迅速致富的行当还是盐业。道光年间,清政府将两淮地区实行的“纲盐制”改为“票盐制”。“纲盐制”就是以“盐引”支盐,徽商长期经营盐业,对盐引加以垄断,从而获取高额利润,并且世代相承。“票盐制”则取消了“盐引”,商人只要向盐政之局纳税领票,就可以购销食盐,不必购买盐引,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徽州盐商的垄断和特权,使他们再也难以获得高额利润了。其三,资本亏空。徽商得以称雄天下,依靠封建政府、获得垄断和特权是其重要手段,在盐业经营方面,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他们也为之付出代价——官府对他们课以重税,还要他们不断捐款以及赈灾助饷等等。仅嘉庆四年到八年,两淮盐商连续6次捐款,共计700万两银子。他们还遭到官府的勒索,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要出“程仪”;本地文武衙门要“规礼”;官员离任时,要出“别敬”。此外,有的商人为了跻身缙绅队伍,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捐纳品衔;为了结交官府,他们又要讲排场,特别是“接驾”活动,耗费巨大,为了讨好乾隆皇帝,歙县盐商江春养了两个戏班,一个叫“德音班”,一个叫“春台班”,广聘四方名角,每年费用达三万金。至于园林别墅、衣服舆马,更是竞相奢侈。这一切,使徽商外表虽然雄厚,实际上却屡屡亏空,真正用于商业经营的资本越来越少了。

徽商的衰落首先从盐商开始,道光以后,徽州茶商一度仍然兴旺,光绪中叶以后,由于洋茶的冲击和洋商的压制,加上徽商自身也有大量非经营性的消费,终于走向衰落。不过,从明代开始,徽商就在全国各地从事商业活动,历经变异,他们中的一部分也跟上时代的变化,转变经营观念,拓展经营行当,取得了新的业绩,如歙县的程霖生在上海经营房地产业,被称为上海第八大“象”(财主),据估计,解放前在上海经商的徽州商人有十三四万之多。

明清两代,称雄于全国的商帮一是晋商,一是徽商。徽商从明代中叶开始崛起,主要从事粮食、木

材、茶叶、药材、丝织品等贸易,并从事盐业经营,其“足迹几遍天下”,长江中下游一带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清代前期,徽商云集扬州,把持盐业,为其鼎盛时期。徽商“贾而好儒”,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在经商活动中讲究“诚信”和商业道德,其经验今天仍值得继承和发扬。但是徽商不注重扩大再生产,其经营利润大多用来回乡置办田产,兴建豪宅,挥霍享受,虽然留下了今天仍然保留的大量的民居建筑,从观念上却显得比较落后。

2. 文化 由于徽州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原世家大族的后代,或者是曾经在徽州做官定居者的后代,徽州人表现出崇尚文化的特点。早在经商之前,徽州人就重视教育,至迟在宋代就有为数众多的徽州人读书出仕,他们为家族带来了荣耀,也造就了崇尚文化的氛围。因此,徽州人从明代开始大批外出经商,文化的优势使他们很容易取得成功。他们在经商的同时,仍然重视教育,本人也“贾而好儒”,有的商人甚至弃商从文,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以后,仍然读书习文,在明代休宁县一个叫率口的地方,姓程的家族成立了“率滨吟社”,老的、少的都参与其中,定期举行诗会,这些成员大部分都经商,他们将所作的诗加以挑选,刊刻成集,至今国家图书馆保存着他们的作品。由于崇尚文化,徽州人著述成风,从而推动各种文化因素的发展。明代徽州的刻书业发达,歙县有个虬村,这个村里姓黄的家族以刻书的精美闻名于世;徽州的文房四宝历史悠久,受到文人墨客的推崇;徽州的学者非常多,在清代,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术;徽州人在绘画、篆刻等文化艺术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

3. 医药 徽州作为山区,药材资源丰富;徽州人崇尚文化,读书成风,“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另外,徽州的自然环境比较封闭,而疾病乃至瘟疫在所难免,所以徽州的医学也积累了丰富的遗产。据统计,从宋代到清朝末年,徽州的名医有五百多人,撰写和刻印医学书籍425部,涉及内、外、妇、儿、喉、眼各科,其内容的丰富性和临床实践为国内外医学界所推崇,被称为“新安医学”。

4. 教育 徽州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美誉。明清两代,徽州除了大量的社学外,还兴建了不少的书院,明代兴建45所,清代兴建了11所,歙县雄村是清朝大臣曹文植(《四库

全书》总裁之一)及其子曹振墉的家乡,那里至今还保留着“竹山书院”的建筑。由于普遍重视教育,在历代科举考试中,徽州籍的进士数量都名列前茅,据统计,宋代徽州籍进士有781人,明代444人,清代517人。清代徽州籍的状元有18人。

5. 建筑 明清两代徽州的建筑目前保存下来的很多,是今天结合黄山重点开发的旅游文化资源。徽州的建筑有三大明显特征。一是古村落的形态,像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西递和宏村,都是很大的村落。这是因为古代徽州人“聚族而居”,清代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一书中说:“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年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每个村落中的祠堂,就是宗族文化的遗存。二是有独特的建筑风格,粉墙黛瓦和用于防火防盗的马头墙,和青山绿水相依倚,构成了和谐的居住环境。三是建筑精致,除了外形富有特色外,其内部有大量的雕饰,门、窗、墙、梁上都有精美的雕刻或绘画,木雕、砖雕、石雕被称为徽州“三雕”。

除了江泽民同志概括的五点之外,徽州历史人物也值得一提。由于徽州文化的孕育,徽州不仅在历朝历代出了大量的进士和文人,还涌现出了一批在中国历史上卓有声誉的人物:宋代有思想家朱熹;元代有思想家郑玉;明代初年有朱元璋的谋士朱升,他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不称王”的主张,有抗倭将领胡宗宪;清代有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戴震,有“红顶商人”胡雪岩;现代史上有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著名学者胡适。

二、徽学——一门新的综合性学科

徽学是1980年代才兴起的综合性学科,它是大量的徽州文献、文书和文物遗存为依据,以历史上徽州的区域文化为直接研究对象,并通过它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徽学之所以能够成立,首先是因为徽州保存了大量的文书、文献与文物遗存。

徽学研究真正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是从1950年代徽州文书被发现开始的。徽州文书的数量非常之多,据有的学者估计,其总数不少于20万份。这些文书内容极其丰富,既有关于徽商经营过程中的协议书,也有土地买卖的合同;既有宗族公约,也有关于禁止赌博、重视教育方面的公约;还有一个

家庭的支出帐本,以及反映徽州民风民俗的各种文书。此外,由于古代徽州人重视教育,在明清两代刻书业又非常发达,各类文献(包括刻本和抄本)的留存也大大超过其它地方。通过这些文书和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古代徽州特别是明清两代徽州社会的具体面貌。

与文书和文献留存的丰富相得益彰,由于徽州地处山区,历来没有受到多少战争的破坏,它的地面又保存着5000多处文化遗存。除了号称“三绝”的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以外,还有完整的村落,有历代文人、官僚、商人留下的各种遗迹,有多处明清古戏台。这些文化遗存为我们了解古、近代徽州进一步提供了实证性的依据,它们和大量留存的徽州文献、文书相互印证,构成了研究古、近代徽州最丰富也最直观的标本。

徽学以徽州文献、文书和地面文化遗存为基本依据,其研究范围不是整个中国文化或者汉文化,而是有着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空间上以历史上的徽州一府六县为基本范围,时间上是从宋代徽州之名的正式确立到清代末年。因为无论是徽州文献、文书还是地面文化遗存,都是属于徽州这个地方的。它们直接反映了徽州古代和近代的历史风貌。徽州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这么丰富的文献、文书和文化遗存,首先就说明了它的区域文化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不仅徽商、徽派朴学有着广泛的影响,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理学等都有其独特的区域文化特点。徽州留存的大量的宗谱和保留的众多的祠堂,表明这个地方的宗族曾经是明清社会结构的重要形式。此外,这里教育发达,人文昌盛,文学艺术创作活跃。凡此种种,都说明徽州区域文化具有不同于其它区域的独特性。

徽学固然以徽州的区域文化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却不意味着仅仅以徽州区域文化为研究对象。实际上,如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样,一个区域的文化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细胞,或者说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早在1930年代,胡适就提出了“小绩溪”与“大绩溪”的看法,徽州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化是联系在一起而密不可分的。徽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徽州的读书士子入朝参政,徽州的文人活跃于各个文化圈,他们既给徽州带来了其它区域的文化,同时又把徽州文化传播到其它地方,并参与到中国大

文化的循环中。徽州文化与中国文化是大文化与小文化的关系。对徽州文化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其它区域的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看,徽州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典型性。除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化特点外,自宋代以来,徽州是理学传播的重要地区,由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就在徽州,徽州人对理学的信奉超过了其它的地区。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其表现之一就是商品经济的活跃,而徽商正是这一领域中的代表。徽商所获得的商业利润,促进了徽州在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些特点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明清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通过对徽州区域文化的研究,可以透析中国历史文化的多方面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徽州保存下来的大量契约文书、谱牒以及其它典籍文献,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依据。特别是1950年代以来发现的大量契约文书,比其它区域发现的文书资料更为集中而丰富,它们不仅反映了官方的制度在民间的实际运作和执行情况,而且直接反映着民间社会生活的情态,足以弥补官方史书和文人记载的缺失,无疑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社会史的重要材料。近年来,一大批学者已经利用徽州契约文书和其它文献,完成了如明代的“黄册”制度等重要学术成果。因此,如同敦煌文书一样,徽州历史文献,特别是数量丰富的契约文书,具有超出地域文化研究的更为普遍的学术价值。它们和典籍文献相互印证,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面貌,提供了新的依据。

自觉地将徽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始于1980年代,因此,徽学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但是,徽学所赖以形成的徽州历史文献越来越被学者们所重视,徽学丰富的学术含量越来越为学者们所瞩目。海内外关注徽学、开展徽学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了“打好徽字牌,唱响黄梅戏,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口号,省委宣传部牵头编纂的《徽州文化全书》共22卷即将出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被教育部首批确定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该中心组织的多个重大研究项目正在开展之中,国外前来研究和访问的学者越来越多,徽州文化正在走向世界,“徽学”正日益成为国际“显学”。